

韩学研究

张清华 著

韓愈



江苏教育出版社

韩学研究

张清华 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韩学研究

(上册)

张清华 著

责任编辑 任 晖

出 版: 江 苏 教 育 出 版 社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发 行: 江 苏 省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淮 阴 新 华 印 刷 厂
(淮阴市淮海北路 44 号, 邮政编码: 223001)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8.5 插页 5 字数 445 400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册

ISBN 7—5343—3311—3

G · 3017

定价: 24.10 元

江苏教育版图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韩愈系列研究丛书编辑出版委员会

顾	问	任继愈	饶宗颐	傅璇琮	卞孝萱
		常有功	王海成	刘峰	李俊彦
主	编	张清华			
编	委	李振山	卢书国	王秀梅	许长仁
		张尔华	杨丕祥	汤文胜	耿则伦
		廉绍兴	薛迪虎	尚振明	郭云德

序

傅璇琮

河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张清华先生自 80 年代中以来,即以主要精力投入于韩愈研究。除了专题论文外,于 1987 年完成五十余万字的《韩愈诗文评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年 4 月,在河南孟州召开“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成立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张清华先生被推举为副会长兼秘书长;会后计划编印《韩愈研究》(第一辑),为出版此书,清华先生又不顾疲累,奔波操劳。而在这期间,他又超然于仕途,沉潜于书斋,对韩愈进行全面的研究,终于又撰成这部约七八十万字的《韩学研究》,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这十余年来,清华先生于韩愈研究事业,不论是在学会的操作上,还是在学术的研讨上,其功不可没,是有目共睹的。

《韩学研究》一书,于韩愈的生平、思想、学术、文学,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论述得非常全面。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为“韩愈

通论”，分上、下两编，上编论思想，又分列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文学思想、教育思想、伦理观念与道德情操等；下编论文学，又分列韩愈与古文运动、散文、诗三节。下册为“韩愈年谱汇证”，每一年之下分为“时事”、“文坛述要”、“韩愈事迹”，以辑集文献资料为主，间有考证。书的最后，则有孟州韩愈博物馆尚振明先生整理的“韩愈家谱”，及韩愈后裔所撰的“韩氏家乘考”、“韩文公后裔家族世系表”等。近十余年来，有关韩愈的研究论著，已出版不少，但就范围之广，论述之全，材料之齐来说，这部《韩学研究》可以说是较为突出的。清华先生在书中还吸取了前人和时贤的不少研究成果，并不时出以新见，材料扎实，议论通达，这样的治学风尚，在目前是很值得倡导的。

书名《韩学研究》，特标出“韩学”二字，我觉得很有意思。在我的印象中，正式提出“韩学”这一学术概念，并予以科学解释的，是撰写于本世纪50年代初陈寅恪先生的《论韩愈》一文。陈先生文章的第一段虽然还把韩愈定在“唐代文化史”的“特殊地位”上，但在具体评论中是超出唐代一朝的范围的。文章的最后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思考：

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社会政治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键人物也。

以中国封建王朝的体系而论，唐朝是一个独立的时期，但从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来说，唐朝确实可分为两

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结束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建立统一的国家，无论经济、政治等都有新的开创，但这种开创大抵仍属于中古社会时期。后一阶段则不同，它的各方面都能与宋以后相连，它已进入封建社会的后期，各方面都发生新的变化。韩愈正是生活在中唐这个前后转换的关键时刻，他既适应时代的变化，提出符合当时社会要求的各种主张，而又以其睿智的历史眼光，在哲学思想、文学创作等方面，作系统拓新之举，“开启来学”。陈寅恪先生认为在同辈文士中，官位有比他高的，名声有比他大的，但以整体成就“不绝于世”来说，是无人能与他相比的，所谓“诚不可同年而语”。这不只是同辈，即以唐代前后期来说，以文学而论，在此之前如李白、杜甫，在此之后如李商隐、杜牧，都有突出的成就，有些方面还超出于韩愈，但他们的成就是在某一方面（如诗歌），韩愈则在诗、文、哲学、伦理、教育等都有“承先启后、转旧为新”的历史贡献，这就很不一样。应当说，在文化学术史上，像韩愈这样的人物，是不多见的。尽管在历史上，对韩愈有褒有贬，争论不一，但其历史地位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正因为有褒有贬，议论不休，更可证明他是一个有历史影响的人物。

陈寅恪先生从六个方面论述韩愈的历史文化贡献：

一曰：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

二曰：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

三曰：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

四曰：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

五曰：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

六曰：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

这六个方面的提法和具体阐释，我们今天仍可从学术角度，进行

探讨,但陈寅恪先生有一个说法是极为坚定的,他认为韩愈的地位价值是如此重要,“而千年以来论退之者似尚未能窥其蕴奥”。之所以如此,依我的私见,一是过去还没有如《论韩愈》那样,对韩愈的文化、学术成就作多方面的整体探讨,而只是从某一方面,即只是从儒学、思想、政治、教育、诗文等作单线的研究;二是过去的研究缺乏历史贯串,特别是像陈先生所指出的,韩愈一方面总括儒家道统之说,而一方面又“开启宋代新儒学家治经之途径”,这后一点尤其重要。

我认为,正因为如此,根据本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二十年以来我国的学术发展,在韩愈研究上,是应该提出建立“韩学”的时候了。这将促使我们对韩愈的研究从两个方面开展:一是整体把握,二是历史演绎。我们不能把韩愈的思想仅局限于儒家范围,韩愈自己就说过:“余以为辩生于末学,各务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读墨子》)这几句话曾受到程颐、朱熹的非议,我们今天看来,这应当显示出韩愈的一种大家气派。更有甚者,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著名论断,而所举“善鸣者”,除伊尹、周公、孔子是“鸣之善者也”外,还提到杨朱、墨翟、管、晏、老、庄、申、韩、张(仪)、苏(秦),可见韩愈一方面承认儒家道统,所谓“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但同时并不为正统所囿,这是他所以能启示后学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我们今天研究韩愈,也当开拓视野,从整体来对这位大学者、大思想家、大文学家作学术史的探索。韩愈是有不少名言的,除了人们所熟知的以外,其他如:“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贤不肖存乎己,贵与贱、祸与福存乎天,名声之善恶存乎人”;“文章之作,恒发于羈

旅草野”；“仆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等等，都很值得在二十世纪学术发展的高度，作新的科学的诠释。因此，我认为，“韩学”的建立，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可以说适其时也。

目下，在舆论界，确有一种趋时之风，即建立什么张、王、李、赵等学之类。我们现在提出“韩学”，完全是出于学术史研究的实际需要，是一种严肃的学术要求。当然，韩学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如何进行，根据目前学界情况，可以作哪些分工，等等，这完全可以如实讨论。我相信，这在我们唐代文学界，特别是在韩愈研究者中，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由张清华先生的《韩学研究》，想到“韩学”的问题，谨借此陈述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仿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一文的结语：“以求当世论文治史者之教正。”

一九九八年元月九日，

北京丰台六里桥寓所

序

卞孝萱

人们在评价韩愈时，常引用宋祁写的《新唐书·韩愈传赞》：“唐兴，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纲，文弊质穷，哇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讨究儒术，以兴典宪，薰醖涵浸，殆百余年，其后文章稍稍可述。至贞元、元和间，愈遂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障堤末流，反剏以朴，铲伪以真。然愈之才，自视司马迁、扬雄，至班固以下不论也。当其所得，粹然一出于正，刊落陈言，横骛别驱，汪洋大肆，要之无抵牾圣人者。其道盖自比孟轲，以荀况、扬雄为未淳，宁不信然？至进谏陈谋，排难恤孤，矫拂偷末，皇皇于仁义，可谓笃道君子矣。自晋迄隋，老佛显行，圣道不断如带。诸儒倚天下正议，助为怪神。愈独喟然引圣，争四海之感，虽蒙讪笑，踣而复奋，始若未之信，卒大显于时。昔孟轲拒杨、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余岁，拨衰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所以过况、雄为不少矣。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韩愈之所以被后世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尊之为“一代宗

师”，由于他对中国文化史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成就是突出的。

在思想上，他在佛老盛行的中唐，能挺身而出，举起复兴儒学的旗帜。在朝野上下崇信佛老的情况下，在道丧难继的环境里，他继承了孔丘仁学，孟轲义礼的传统儒家思想，建立了中国思想史上的“道统”。儒学道统的建立是对儒学最好的捍卫与发展。不仅如此，他还在中国传统儒学的基础上完善了孔孟的学说，如他在《原道》里所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这比孔丘所谓“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的“仁学”，不仅讲得更明确透辟，克服了孔丘思想里向后看的保守一面，也使“仁学”具有更普遍的意义。孟轲常把“仁义”放在一起，认为“义”是合于某种道和理的道理。而韩愈则把“义”解释为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必须符合一个“宜”字。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受《孟子·尽心下》最后一段的启发，明确提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原道》）孟轲以接受孔丘传统自居，却不明说，只暗示曰：“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尽心下》）当时和孔丘出身地最近而有名望的儒者，除了孟轲，更无别人。孟轲说“无有乎尔”，正和“夫圣，孔子不居”（《孟子·公孙丑上》）一样，是不能明说的。他认为孔丘是“古圣人也”，所以“愿学孔子”，自认为是孔丘学说的继承人。韩愈也以继承孔孟道统自居，只说“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原道》）和孟轲一样，把自己当成孔孟真正的继承人。韩愈不仅

继承儒学，捍卫儒学，建立道统，还在继承旧道统的基础上创立新儒学。他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其理论著作“五原”和《读荀》、《读墨子》、《读鶡冠子》等文章里。举其大要：其一，韩愈在孔孟性善论、董仲舒善恶相混说之后创立“形于上者谓之天，形于下者谓之地，命于其两间者谓之人”，“是故圣人一视而同仁”（《原人》）的天人一体同仁理论，完善了中国本体人性哲学学说，有力地抨击了佛教绝人欲、灭人性之论。其二，韩愈继承了民贵君轻思想，提出“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原道》），“主而暴之，不得其为主之道”（《原人》）的道高于君、人道高于君权的理论。其三，韩愈的道统论把儒学治国的政治作用与治心的教化作用结合，使儒学政治上的正统与儒学学术上的道统结合起来，即把治世与治心结合起来。韩愈道统的建立，标志着他把一切学术（道）思想都规范于儒家的学术道统里。道统说，以韩愈为发端，而形成于朱熹。韩愈为传统儒学的发展立了大功。在佛老风行，儒学“道丧”的情况下，经韩愈的提倡，不仅把这一传统思想继承下来，确立了它不容抹煞的地位，且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新儒学，开宋代程朱理学的先河。从这三点即可看出韩愈儒学思想之精湛、丰富以及他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地位的重要。因此，早在晚唐时，皮日休就有《请韩文公配飨太学书》，云：“文中之道，旷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之文，蹴杨墨于不毛之地，蹂释老于无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又说韩愈“身行其（孔子）道，口传其文，吾唐以来一人而已。不得在二十二贤之列，则未闻乎典礼为备。伏请命有司，定其配飨之位”。其后，宋人石介云：“噫！伏羲氏、神农氏、黄帝氏、少昊氏、颛顼氏、高辛氏、唐尧氏、虞舜氏、禹、汤氏、文、武、周公、孔子者，十有四圣人，孔子为圣人之至。噫！孟

轲氏、荀况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五贤人，吏部为贤人之卓。不知更几千万亿年，复有孔子；不知更几千百数年，复有吏部。”（《尊韩》）他认为：对后世思想文化史影响之大者，十四圣人里，莫过于孔丘；五贤人里，莫过于韩愈。孔丘、韩愈世世代代为大家尊重，而列入世界文化名人。

在文学上，韩愈领导了中国文化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文学革新运动，它的成功，不仅改变了中唐人的文学观念，也奠定了中国文学散文发展的基础。唐代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堪称最辉煌的时期，在盛唐出现了诗的高峰之后，中唐又以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为标志，形成了唐代文学发展的又一高峰。在这个影响深远的“古文运动”中，韩愈不仅以其系统而明确的理论，领导了这一运动，还以其丰富而成功的散文创作，使这种新型的散文体式占据文坛，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韩愈的散文打着复先秦两汉之古的旗号，实际上是文学发展史上的新开拓。这一新的开拓，标志着中国散文史上的一大转折，开辟了中国散文发展的新时期。自韩、柳以来形成的这种新型散文体式，一直统率着中唐至清末一千余年的文坛。韩愈的散文气势恢弘，陈言务去，清新自然，超逸绝伦。对于变化复杂的社会生活，无事不可写，无情不可用。于语言文字，或古语，或口语，运用无不得心应手，出神入化。韩愈之文，写大事，举重若轻，游刃有余，把读者引入巨大的历史变革的社会潮流之中；写小事，细腻入微，诙谐有趣，把读者引入社会底层的日常生活，以小见大。韩愈之文，品类繁多而齐全，不论哪一类文章无事不宜，无品不胜，都写得十分精彩。其成就之高，正如苏轼《书吴道子画后》所说：“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

矣。”韩诗在继承李杜诗艺的基础上，虽以怪奇生新，以文为诗，却能做到妥贴排奭，独辟蹊径。唐诗博大精深；宋诗坦易平直。唐诗重在抒情；宋诗包含哲理。中国诗的这种发展轨迹，可以在韩诗的散文化和述事说理中，找到渊源关系。韩诗开宋一代诗风，如欧、苏、王、黄，无一不受韩诗影响，就是反对韩愈以文为诗的陈师道，也学韩诗。正如叶燮《原诗》里所说：“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韩愈在诗坛上地位之高，影响之大，亦如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所说：“退之诗，大抵才气有余，故能擒能纵，颠倒崛奇，无施不可。放之则如长江大河，澜翻汹涌，滚滚不穷；收之则藏形匿影，乍出乍没，姿态横生，变怪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苏黄门子由有云：‘唐人诗当推韩、杜，韩诗豪，杜诗雄，然杜之雄亦可以兼韩之豪也。’此论得之。诗文字画，大抵从胸臆中出。子美笃于忠义，深于经术，故其诗雄而正；李太白喜任侠，喜神仙，故其诗豪而逸。退之文章侍从，故其诗文有廊庙气；退之诗正可与太白为敌。然二豪不并立，当屈退之第三。”韩愈能与李、杜鼎足而立，可见其诗成就之高。

韩愈在儒学史及文学史上地位的确立，与他重视教育、收招后学分不开。由于韩愈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结合上取得了世所公认的突破与成功，使他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孟之后的大教育家。自魏晋南北朝至韩愈生活的中唐，形成了从师为耻，做师为人指骂的坏风俗。韩愈却不顾流俗而热心从事教育事业，他除了平时收招后学、授业传道外，一生四为学官，三为博士，最高做到国子祭酒。韩愈在《师说》里讲：“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

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又在《进学解》里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夫大木为宗，细木为桷，櫨栌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登明选公，杂进巧拙，纡余为妍，卓犖为杰，校短量长，惟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从这些精辟的论述里，可以看出韩愈教育思想的先进性以及思维方法、教学方法的灵活性和针对性。正因为他对“师”下了完整的定义，提出了一整套别人还未曾系统阐发的教育理论，破除师道的封建性，倡导能者为师的科学性以及灵活多样、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使他成为自孔、孟以后少有伦比的大教育家和思想界、文坛、教育界的领袖和宗师，对中国文化史做出了不朽贡献。

韩愈的贡献还不止以上三个方面，他在经济、军事、政治和文化传播交流上，都有突出业绩。尤其是贬潮州的八个月，对中原文化的传播以及东南、特别是潮汕地区文化发展所起的作用，为后世各代学者敬仰。

以韩愈研究内容的丰富性、深刻性，韩愈在中国文化史上地位的重要性及他对后世的影响与可借鉴性，有见识的学者早想把韩愈研究作为一门学问。如1986年饶宗颐先生在汕头韩愈学术讨论会上就发表了《宋代潮州之韩学》的演讲，说：“宋世崇尚韩文，一如诗家之尊杜，蔚为风气，柳开号‘肩愈’，石介著《尊韩篇》，北方之儒重倡尊王攘夷之说，欧阳修因之作《本论》。宋世文

章,实以韩愈为中心,姑名之曰‘韩学’。”两宋对韩愈的研究可谓为“韩学”的发端,历元、明、清至今,韩愈的研究,虽有盛衰,未曾中断。为了全面、正确认识韩愈,把韩愈的研究步步深入,正式建立“韩学”是十分必要的。

建立“韩学”,必须从基础做起,才能像建高楼大厦一样,基固楼坚,巍然屹立。张清华先生以他多年研究的实绩,出版这部《韩学研究》,就是为了把韩愈研究引向深入而做扎实的基础工作。此书分几个部分:其一是《韩愈通论》,这是在吸收古今人研究成果的同时,融汇了个人的认识和体会,对韩愈的品格、思想、诗文著作,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评述。《通论》的写作有几个特点:一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评价韩愈。如对韩愈哲学思想的评价,《通论》不囿于过去的框框,而是从韩愈现存诗文言论的实际出发,从这些作品里所反映出他对自然现象、社会问题的认识及处理社会问题的实际过程,得出韩愈的哲学思想:自然观偏重于唯心,分析自然变化时多表现出形而上学的方法;在认识和分析具体社会问题时又多从实际出发,具有唯物辩证观点。没有把韩愈这个复杂的研究客体简单化。在对待社会问题上,《通论》也不为往昔之论所囿,而认为韩愈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个成员,对封建统治阶级的特权、制度是自觉维护的,从这一点上看韩愈是不折不扣的封建社会的卫道者,认为皇权、等级制度是天经地义不能改变的。然而,他的文学观、诗学观则是建立在破旧创新机制的基础上,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的观点,因而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又如《通论》在评价韩愈与柳宗元在中唐“古文运动”中的作用与地位时,则是从中唐文坛的实际出发,指出韩愈举起散文革新的旗帜,开始新型文学散文的写作实

践,都比柳宗元早。韩愈进入长安的贞元初,就开始用奇句单行的散文写作,柳宗元则是在贞元末年,尤其是贬永州之后,才真正有意识地写奇句单行的新型散文的。故《通论》指出:韩愈与柳宗元在中唐古文运动中的地位,一是主帅,一为主将。姚铉《唐文粹序》说:“惟韩吏部超卓群流,独高遂古,以二帝、三王为根本,以六经、四教为宗师,凭陵轹轹,首唱古文,遏横流于昏垫,辟正道于夷坦。于是柳子厚、李元宾、李翱、皇甫湜又从而和之,……”韩愈的首唱与主帅地位是无法否定的。不能仅从韩柳所存散文创作这一个方面出发,去评价韩柳在中唐“古文运动”中的地位。《通论》认为,评价文学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必须从当时文坛实况及其创作实绩两个方面出发,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与评价。二是多角度地观察、分析韩愈,以求得对韩愈及其创作的全面认识与评价。《通论》认为:韩愈是一个复杂的人物,政治态度的保守与进步;世俗观念的高尚与庸俗;处理社会问题上既表现了维护阶级利益的偏见,又表现出体贴下情和对百姓的关心与同情;文学观上的创新和涉奇,……等等,都表现韩愈是一个复杂而丰富的研究客体。三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不以此否定彼,也不以彼否定此,更不以偏盖全。如对“永贞革新”这个重要问题,《通论》不因韩愈实未参与,为他对革新的否定而回避;更不因为韩愈诗中说了否定革新特别是骂二王的话,硬把他与俱文珍等人掺和在一起。四是评价韩愈功绩时,既要说够,也不拔高;指出其过失时,既不回避,更要讲清楚。如上宰相三书及上李实书,就是要借助当权者的力量求得官职,说他向上爬也无不可,当时很多文人都是这样做的;但是他们进入仕途的目的,大都是为了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否则韩愈就不会已得官又不惜